

科举制度与 中国文化

金诤·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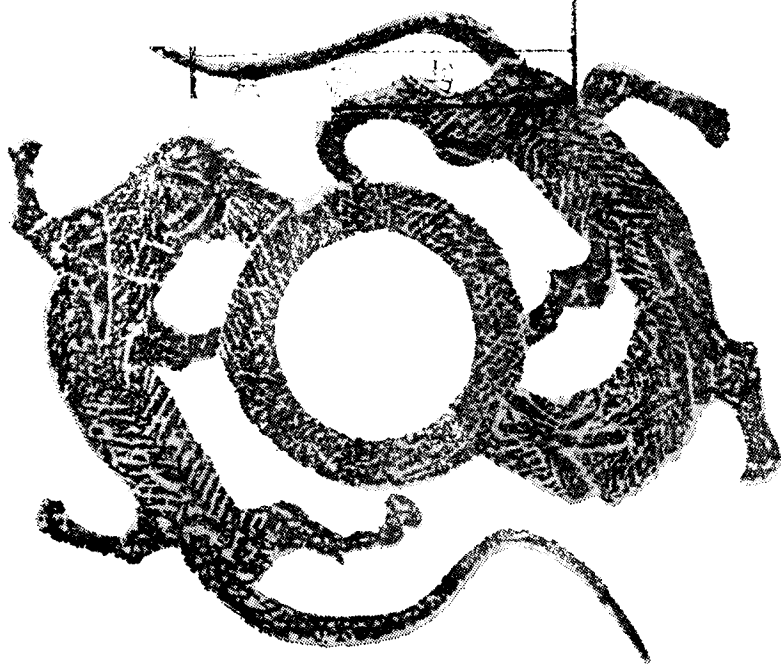
269 9.8

科举制度与 中国文化

金诤·著

200 06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张珏

封面装帧 邹纪华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金 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75 字数 166,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5,000

ISBN 7-208-00908-2/G·156

定价 5.00元

DH09.104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16
一、科举制度的渊源	17
二、科举制度的社会文化背景 文学、伦理与政治	19
三、秦朝的教训 汉代察举 “智囊”晁错的对策	24
四、董仲舒对策 察举与儒学独尊 今、古文经学	28
五、察举的弊端 “月旦评”与世族门阀 士风的虚伪	33
六、曹操“唯才是举”与建安文风 “九品中正制”	35
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世胄蹇高位， 英俊沉下僚”	38
八、南北世族各大姓 儒学的衰落与玄学、文学的兴盛	40
九、世族的衰落 考试的强化	44
十、科举不始于隋 隋君臣之嫉贤妒能	46
第二章	50
一、唐科举的“生徒”、“乡贡” 韦应物与《昆仑奴》 刘蜕“破天荒”	51
二、各种科目 明经科 帖经 墨义 时务策	53
三、进士与诗赋 《湘灵鼓瑟》 《终南山望余雪》 《日五色赋》	56

四、“省试” 李贺与“家讳” 放榜·····	62
五、“身、言、书、判”——吏部铨试·····	65
六、“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新科进士的庆宴·····	67
七、诗歌的黄金时代——科举与唐诗·····	69
八、“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通榜”与“行卷”·····	72
九、唐代制科 刘蕡制策 “野无遗贤”的笑剧·····	77
十、世族与庶族的科举斗争 杜牧的愤懑 牛李党争 常袞与崔祐甫·····	81
十一、科举在中唐的发展 科举与人才 儒学复兴·····	86
十二、“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李商隐与党争 从杜甫 到罗隐的悲哀·····	88
十三、《送董邵南序》的政治意义 黄巢、科举与唐朝 的灭亡·····	94

第三章·····97

一、北宋科举 别头 锁院 弥封 誊录·····	98
二、郑獬的得意与苏轼的懊恼 世、庶界限的消失 文官政治的确立·····	103
三、文官政治与宋代社会 人才的高峰 文官政治与 宋代的国势·····	108
四、庆历科举改革 儒学复兴高潮与理学的产生·····	112
五、王安石改革科举 思想统制 王安石经义 《参也鲁》·····	115
六、苏轼《议学校贡举状》 新、旧党争与科举·····	119
七、欧阳修、司马光“逐路取士”之争 苏轼的建议与	

《水浒传》的倾向 朱熹《学校贡举私议》	121
八、宋代制科 苏辙制策 宋仁宗之仁	125
九、科举与北宋古文运动 欧阳修与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128
十、宋诗的议论化与宋词的抒情化 “奉旨填词柳三变”	134
十一、宋代文化精神 “劝学文” 重文轻武之风	137
十二、宋代科举的弊端 张九成中状元与苏洵、陆游的心酸	141
十三、科举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 南戏、笔记小说中的科举悲剧	145
第四章	149
一、耶律楚材与元代“戊戌选试” 忽必烈与儒生	150
二、严酷的民族压迫 胥吏政治 儒生对科举制度的批评	152
三、科举的恢复与儒生的激动 民族和等级歧视 伯颜再废科举	155
四、“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吏治的败坏 儒生与朱元璋的胜利	161
五、程朱理学在科举中的确立 诗文的衰落与戏曲小说的兴起	166
第五章	170
一、明、清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	171
二、“南、北榜之争” 分省取士与明、清王朝的巩固	177
三、贡生 监生 专制统治下的教育 “孟子节文” 书院的遭遇	181

四、八股取士及其源流 状元韩菼的八股文	
八股文风·····	184
五、八股文题 破题 长联·····	188
六、清初关于八股存废之争 试帖诗·····	193
七、明、清殿试标准 书法与状元 毕沅的侥幸与 龚自珍的遗憾·····	196
八、从“丁酉”到鲁迅的祖父——血淋淋的科场案·····	199
九、“维民所止”等等——科举与文字狱·····	206
十、八股科举对士人的奴化 考试成“瘾” 清朝以 科举笼络汉人·····	209
十一、中国文化的落伍 八股士人的空疏愚陋 文学、学术的衰落 乾嘉学派 ·····	214
十二、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笔下的科举·····	221
十三、西方新思潮的侵入 洪秀全与科举 “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 科举的废除·····	228
十四、新教育、新文化、新知识阶层的兴起·····	234
十五、民国的文官考试 科举在朝鲜、越南·····	237

绪 论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官本位”社会，政府官僚作为社会的最高阶层，不仅直接控制国家行政、立法、司法、经济、军事，而且控制或干预思想、教育、学术、宗教等意识形态活动；而全体政府官僚的活动又围绕着一个最后的中心——皇帝。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非常不同于西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地方之一。

创造出中国这样一个官僚阶层的具体制度，就是代表皇帝举行的科举考试。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一切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以及其他学问家，很少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社会上层，由此获得了作出其贡献的活动基础；而同一时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构有巨大负面影响的那些大人物，也很少不是同一条路的过来人。如果说，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是知识分子，那么中国无数代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度从中国文化土壤中产生出来以后，又再创造了中国文化。

—

在科举制度的作用下，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

文官政治。

我们知道，作为对贵族政治、武人政治和宗教政治的一个积极否定，文官政治是近代社会普遍接受的原则。但是在西方，文官政治的确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以后的事情。在中世纪欧洲，由贵族和教会共同把持的政教合一体制中，几乎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文职官员。十五世纪以前，英国的全部“官员”就是贵族与教士，在十六世纪以前的法国、十七世纪以前的德国，统治国家的仍是割据一方的封建诸侯。日本也与此差不多，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天皇只有虚名，实际统治者是各个封建领主——大名，其下属官吏主要还是世袭性的武士。

而在中国，诸侯分封割据、治理国家的局面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朝就结束了。在大一统的秦汉时期，出现了由中央政府任命和罢免的职业文官队伍，与此同时，科举制度的源头——举荐为主考试为辅的察举制度也就出现了。

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官政治随着察举——科举制度的成熟而成熟。严格意义上的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产生于唐代，到北宋，弥封、誊录、回避等科举立法全面完善，清除了举荐制残余，一切以考试为准，科举制度成熟定型，而文官治国体制也正是在北宋彻底地、稳定地建立起来，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赞赏地记述中国的文官政治：“标志着与西方的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①

中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考试办法的国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六章。

家。《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第十四版)介绍考试制度说：“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公元前1115年)，及其定期举行的考试(公元前202年)。”其根据大约是先秦儒家经典的记载，如《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等，以及《周礼》、《礼记》关于西周“选士”的说法。而确切意义上的笔试、口试办法，的确是在西汉初年的察举制度中就“定期举行”了。而在西方，从希腊罗马时代直到中世纪，都没有任何关于考试的确切记载，即使在大学中也主要通过论辩、演讲来衡量一个人的学业水平；特别是笔试，到十八世纪以后才出现于欧洲的大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官选拔促成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现行欧美、日本等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究其根源，是在中国科举制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里，“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下层社会的人几乎没有合法跻身上层的任何途径。早期来华的西方人如利玛窦等人，都非常注意中国的科举制度，高度评价这种不论出身、财产、地位、名望等条件，唯凭个人学识进行平等的考试，竞争政府公职的办法。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如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由于不满当时的西欧社会现状，都热心研究中国文化，试图从中寻求改革西欧社会的可能性。^①他们往往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没有贵族、除了皇帝以外人人平等的“开明专制”社会，因为科举制度保证了这个社会由知识分子统治，其上下阶层的分子不断地合法对流，从而阻止了权力的世袭化。法国经济学派、重农学派代表奎纳在所著《中国的专制主义》中正式主张仿行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十九世纪，英法

^① 见科奇温《十八世纪欧洲与中国文化的接触》。

两国介绍并呼吁采用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的人更多了，这样，从1791年起，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试；1853年后，英国也逐渐推广文官考试。正如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民权初步》中所说的：“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古代文化能够在几千年间未曾中断地持续下来，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大体稳定地维持着疆域广大的统一形态，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官政治。文官政治造成了一个脱离狭隘地域、家族利益，脱离武装实力的知识分子（儒生）阶层，这个阶层的利益、活动都与中央集权直接联系；文官政治树立了一个与自身高度适应的社会政治思想——儒家思想，并通过文官选拔使之成为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进而传导向整个社会，形成一股统一的民族国家所必须的精神凝聚力。把中央集权与儒生阶层和儒家思想结成三位一体的，正是中国的文官选拔、考试制度。

在封建社会，国家统一的最大阻力来自那些以各自地域、家族为背景的世袭贵族阶级，而平等考试的科举制度则天然地否定着贵族政治，从而使最高皇权越过世袭贵族而伸入中下层社会“寒士”，由此获得了广泛得多的社会基础。两千年来中国统一与分裂局面的演变更替，跟科举制度的自身演变发展是同步的。建立察举制度的两汉，是中国第一个持续稳定的大一统王朝；实行有利于世族门阀的“九品中正制”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长久的分裂时期；在繁荣统一的唐朝，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而“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时期，朝廷鉴于军阀割据势力的猖獗，努力发展文官政治，扩大科举取士，科举士人开始在政府中

占优势；到北宋，科举制度的充分成熟使世袭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在中国历史上基本消失（即“世族”与“庶族”的界限消失。至于元朝蒙古贵族和清朝八旗贵族，则属民族斗争情况下的例外。）北宋以后，封建政权内部分裂对峙的局面（这在前期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也基本上消失了。在东亚国家中，封建社会形态近似于中国的朝鲜、越南都引进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唯独在贵族领主占支配地位的日本，尽管积极吸收中国文化，却偏偏不接受非贵族性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从法律原则上说，是超阶级的，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一经考取就无可争议地升入统治阶级（当然实际上最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由于无法受教育而不可能享受应试权利），历代封建帝王为了防范贵族官僚窃取权力，也常常认真地维护科举制度的超阶级性。从唐代开始就有了打击科场舞弊的记录，清代的科场案更是血淋淋的。因此应当承认科举考试的形式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在历史上确实也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比较宽松，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唐宋的两个人才高峰期都与科举制度的发展阶段相重合。一是中唐时期，科举的扩大，吸收了陆贽、裴度、刘晏、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一大批人才；二是北宋中叶，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兄弟、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曾巩、黄庭坚、秦观、柳永、沈括、苏颂……政、史、文、哲乃至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第一流人才涌现密度，居历代王朝之冠，而且他们都是进士出身。

科举制度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经常不断地更新，使社会上下阶层在和平与合法状态中经常不间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保持了封建国家机器相对的活力与效率，因此尽管封建王朝代相更迭，但封建中国的社会实体却不间断地延续着。1847年，英国人麦杜思在伦敦出版了他的《留华札记》，书中极力主张英国仿行中国的“公职竞争的考试制度”，并说：“中国的国脉之所以历久不坠，纯粹地完全地是由于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于能起用贤能有学识的人。”当然，科举选拔之士远不都是才德兼备者，也没有哪种人才选拔制度能确保这一点。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具体化，所谓“儒者之说，其精者为道德，其粗者为礼乐刑政。”^①因此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准则，虽然有各种弊端，但是它确保了入选者的素质和知识结构与封建国家的需要一致，从而有可能维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不仅能压迫剥削农民阶级，也能把这种压迫剥削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使不能挽救某一王朝的灭亡，至少也能不危及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阶级这一基本封建生产关系的存在。科举制度造成的文官政治，同贵族、武人政治比较而言，是具有相对清明度的。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统治思想，这一状况，正是通过文官选拔考试制度确立并维持的。鲁迅说孔夫子在古代中国只是一块“敲门砖”，那么，这“砖”所要“敲”的，正是科举之“门”。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升沉演变，跟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正是同步的。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就是在应汉武帝察举考试的策问时提出来的；而魏晋南北朝期间则是儒学的中衰期；中唐时期，以

^① 戴表元《大学中庸孝经诸书集解音释序》。

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掀起了儒学复兴的浪潮；到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全面胜利，儒学开始向自己的新发展阶段——理学转化；当科举考试采用“经义”的形式后，理学通过科举对后期封建社会实现了更权威的统治。

另一方面，也正是儒家学说为科举取士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那么知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从政当官；孔子又强调“有教无类”，让教育向社会各阶级开放，那么也意味着政治权位向社会各阶级开放。孔孟从来不谈人的出身、血统，却强烈反对贵族诸侯僭取天子的权利，并希望天子的统治基础越过贵族而伸展向中下层社会。因而平等竞争的科举考试正是儒家上述政治理想的实现。

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学、史学的影响特别深远，它本身也正是中国民族“尚文”特质的体现。“文”在中国古代是兼指“文学”与“文化”的，“文”就是自然与社会秩序的显现，因而人才的选拔自然要以“文”为标准。古代中国几乎一切的文字记录都有文学性，从诏命奏议、司法判词到史籍政论、书信序跋等等，这些在其它民族不入文学之列的作品，在中国反而是较之小说戏曲等更为正宗的文学。由于科举考试不许考生超越儒学范围，所以考试的内容因雷同化而反倒不重要了，考生既无“说什么”的自由，只好转入“怎么说”的形式追求，科举考试结果成了一种文学修辞技巧的考试，比赛谁能更娓娓动听地陈述同样的内容。历代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对此强烈批评，王安石因此废除诗赋考试而改用议论散文体的“经义”，但久而久之，这种经义却又诗赋化了，成为讲究对偶排比甚至声韵格律的八股文。

唐代取士重诗赋，宋代取士重策论经义，这对于唐诗、宋文的繁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是人们所不齿的八股文，由于它

的基本结构是两两相对的散体长联，因此明清以来人们做对联（尤其是数十字甚至数百字的长联）之风大盛，至今各地名胜古迹保留下来的名联，多出於明清人之手，做对联至今仍是中国人日常文化生活的內容（包括报章杂志标题），同世界其它民族的文学比较，中国古典文学实在是最讲究修辞技巧等形式美的文学。

中国民族又是一个极端重视历史的民族，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拥有象中国这样丰富、完备、详实的数千年连贯不绝的历史记载。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这些经典本身就是先秦历史的记录评价（因此章学诚《文史通义》说“六经皆史”），科举考试中长期存在的“论”的体裁，就是以史论为主的。因此科举考试不仅以文学取士，也是以史学取士。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标题，就再明白不过地指出了“史”与“政”的关系。科举制度造成的一支有高度文史知识素养的文官队伍，为古代中国建构出一个相当先进完善的政府组织形式。

早在唐代，中央政府就形成了分管官员机构、文化礼仪、财政、司法、工程、军事等日常政务的吏、礼、户、刑、工、兵六大部门，其下又有更细密的分工编制，乃至教育、考试、监察等等无所不至；北宋时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的一整套组织管理机构更加庞大严密，形成一个层层节制、互相关联的庞大行政网络；唐代以前，就形成了从正一品到从九品的文官品位制度，这些，不仅那些除了收税和征战以外不知政治为何物的西方封建领主望尘莫及，连初期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所不如。

由于科举制度将权力、财富、地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这就造成了中国民族极端重视教育、刻苦勤奋读书的传统素质。利玛窦等西方人把古代中国社会看成是“文凭社会”，把秀才、举人、

进士直接译为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名称，认为中国社会等级是由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来划分的，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明清时代一个穷秀才，即使一直考不取举人并且再也不考举人，他仍然是社会上受尊敬的一员，官府和富人也必须“以礼相待”。美籍学者丁肇中博士在谈及中国留美学生普遍成绩优秀时开玩笑说：“因为中国从古以来就是一个考试社会。”中国现在虽然落伍了，但其知识分子中仍能涌现出不少世界水平的科学和学术大师，恐怕的确跟这种重视教育、勤奋读书的传统有关。

二

遗憾的是，科举制度对于中国文化的上述积极性，几乎同时地挟带着巨大的消极性。可以说，科举制度促成了中国在古代的先进，也注定了中国在近代的落伍。

知识阶层是社会的文化代表，然而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却垄断了这个阶层几乎全部精力。行政权力至上，这就决定了富依赖贵，贵依赖权，否则财富就没有保障。地主富商要想继续发家或逃避破产，主要依靠政治手段而非经济手段。因此封建社会的富裕之家无不谋求科举仕进，至少也要培养出一个能与当地官府平等打交道的秀才，这就造成弥漫全社会的“官本位”意识，使读书应举、从政当官成为全知识阶层的必由之路。而官僚机构无论如何扩大，也永远只能容纳知识分子的极小部分，科举制度却向每一个读书人展示着进入官僚集团的可能性，他们出入科场、头白身衰仍锲而不舍地追求，以为“今科虽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之间其人已老。”^①《儒林外史》里的周进、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

范进之流，考到头发花白也中不了秀才，但既已属于“读书人”了，即使穷得饿饭也还是要考，而不肯改行做点别的对自己对社会都有点益处的事。千百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就在科举考试的绞肉机中挣扎消磨，脚不出书斋，眼不离四书五经、诗赋文章。从整体上说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是畸形的，只要不能应举做官的就不成其为知识。

中国古代文化以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史学、文学(主要是诗、文。并且文史学科也因此往往沦为政治的附庸)为主，但是在音乐、舞蹈、戏剧、造型艺术等方面却比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其它古老文化落后；直到明清之时，中国的建筑、雕塑艺术也未能达到古希腊、罗马的水平。至于自然科学更不必说了，古代中国的一些实用工艺技术虽然比较发达，但几乎都出于地位低下的体力劳动者之手，被士大夫知识分子视为“奇技淫巧”；这些实用技术由于不能与知识分子相结合，的确也只能停留在“奇技淫巧”的低层次上，不能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力，象北宋苏颂、沈括、明朝徐光启这样的自然科学学者，在科举士人中只是极其偶然的例外。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曾比较中日两国在面临西方文化挑战时的不同反应说：“中国的官僚机构是由那些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和擅长诗文的人组成的，而日本的武士官僚则对武器感兴趣，因而也就对科学技术感兴趣。”^①当部分清朝士大夫领教了洋人“坚船利炮”的沉痛教训，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时，多数士大夫仍然顽固地反对。同治六年(1867年，即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时)，清朝大学士倭仁、山东监察御史张盛藻等上奏声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朝廷命官必用科举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

①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